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新形势下哲学社会科学教师的使命

朱启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承担着神圣使命。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高校教师要坚守教育者先受教育,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更好承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哲学社会科学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影响重大。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必须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担当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和服务社会的使命。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严守意识形态阵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旗帜和灵魂。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与科研过程中,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教师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感情上。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工作中,哲学社会

科学教师必须严格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在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的问题上,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自觉做到“三个坚持”和“四个自信”,深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二、坚持身正为范,提高师德修养。现在和未来世界的竞争是教育的竞争,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教师作为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主体,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要培养造就高质量、高规格的人才,就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而教师队伍建设的核心是教师的师德,师德决定了教师的素质,师德又决定了教育的质量。因此,加强师德建设是时代的需要,是深化教师队伍建设、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一环,也是搞好教育的行风建设,决定教师队伍建设和成败与否的关键。每位教师要严格遵守《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自尊自

律,以人民教师特有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赢得全社会的尊重,努力传承创新文化。

三、坚持理论创新,提高学科水平。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对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任务之一,是进一步开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新局面的关键所在,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建设的必由之路,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本质要求。为了适应时代和形势的需要,我们要努力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我国要整合哲学社会科学的各种资源,实行联合合作,大力协同攻关,加强

理论研究,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学研究方法创新,推进“双一流”建设。要扩大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提升国际交流的能力,争取话语权,积极传播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发展制度、发展道路,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

四、坚持问题导向,发挥智库作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正是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必须紧紧贴近的现实,它与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都有密切的联系,有许多重要课题需要我们下功夫去研究。我们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面向社会,着眼于促进科学发展,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

汲取理论创新的营养、动力和源泉,加强理论研究与创新。善于把党和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上升为理论成果。要把理论研究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同推动重大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发挥智库作用,使理论成果更好地转化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国家的法律法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五、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文化传承创新发展。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各民族共同道德基础,是新形势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文明的积淀,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精神食粮。哲学社会科学教师教育并引导学生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生的思想观念、落实到行动上。

六、坚持育人为本,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情况更加复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面临多样化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市场逐利性的挑战,传统教育引导方式面临网络新媒体的挑战,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面临敌对势力渗透争夺的挑战。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大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拥护信任、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高度认同,确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战略工程。哲学社会科学教师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任务,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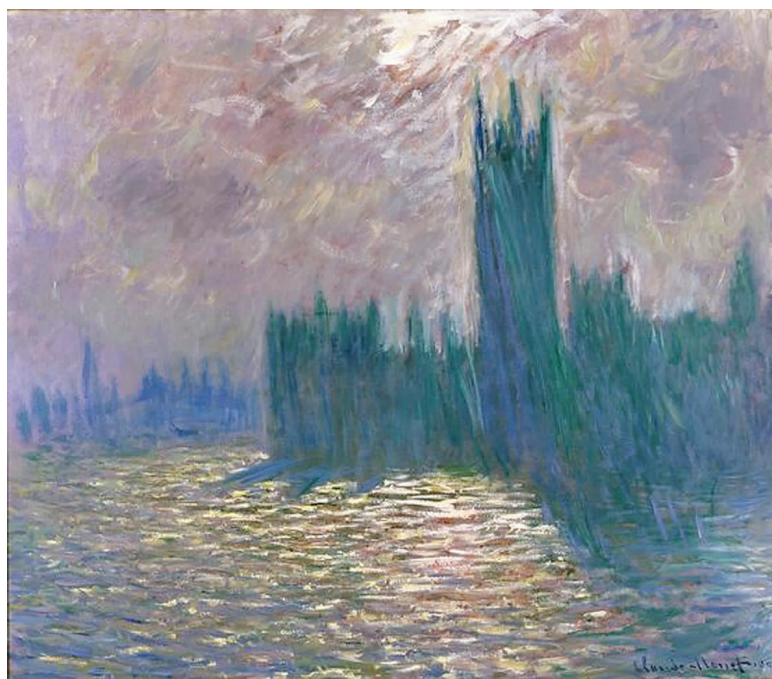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哲学社会科学教师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深刻领会并践行党的方针政策,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扎实工作,开拓创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他山之石

上海环保立法与英国经验的借鉴

陈兆丰



左图为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的国会大厦系列作品之一,画的正是浓雾中的伦敦。右图为2012年,泰晤士河上千船巡游以庆祝女王登基60周年。

先污染后治理在世界城市发展进程中具有普遍性,其中英国更为典型。上海工业发展较晚,但由于进程快、门类多、规模大,环境污染程度十分严重,治理任务相当艰巨。为此,英国的经验值得借鉴。

英国环境治理的启示

英国环境污染前后持续 200 多年,18 世纪工业革命在推动英国经济迅速腾飞同时也给环境带来巨大破坏。一是空气质量日益恶化。在伦敦,烟与雾相互混杂,长年萦绕在城市上空。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出版于 1838 年,尽管这是译名,但仍可见伦敦被称为雾都的历史。1924 年客居伦敦的舍生先生曾身临其境,他在作品中写道:“乌黑的、浑黄的、绛紫的,以至辛辣的、呛人的伦敦雾,是驱雾的唯一。”时间来到 1952 年 12 月 4 日,一场空前灾难降临伦敦。雾都上空高压带滞留,激增的雾霾笼罩城市,由于浓雾在室内弥漫,伦敦歌剧院演出的歌剧《茶花女》也被迫中止。从 12 月 5 日到 8 日,伦敦的雾霾始终不散,因吸入有毒空气,4000 余人死于非命。

二是河流遭受严重污染。英国工业革命使棉纺织业成为最大行业,其对环境的污染也最严重。由于生产过程直接将污水排入河道,河流遭到严重污染。19 世纪前后,英国工业地区普遍河水黝黑、发臭。本来清澈宜人的伦敦泰晤士河成了奇臭无比的污水沟,以致河边议会大厦窗上也挂起一条条浸过消毒药水的被单。1878 年,“爱丽丝公主”号游船在河上沉没,死亡 640 人,许多人并非溺水死亡,而是因喝进污染的河水。

三是城市环境不断恶化。工业革命后,城市人口大量集聚,由于缺乏管理,街道垃圾遍布,排水设施的怪味,流淌的污水充斥着化学污染物的怪味,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肺结核、支气管炎、上呼吸道感染成为当时常见病和死亡主因。由于长期处于污染环境,大量人群体弱多病,无精打采,养成了对烈酒和麻醉剂的嗜好,在饱受疾病折磨的同时,心理创伤亦日益严重。

19 世纪中后期,英国社会对环境污染和疾病流行日益担忧,议会开始通过立法寻求解决途径。为解决水污染和城市污水问题,1847 年英国议会

通过《河道法令》,禁止污染任何作为公共水源的河流、水库、供水系统的管道及其他部分,并授权卫生管理机构对没有供水防污措施的机构切断供水。1875 通过的《公共卫生法》,内容包括供水、排水、房屋、垃圾、食品卫生、疾病预防等行业的管理,从而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公共卫生体系。1876 年又颁布了《河流污染防治条例》,两年后通过《公共卫生条例》,至此基本建立起完整的水污染防治法律体系。

在解决大气污染问题上,1863 年议会通过第一个《碱业法》,要求制碱行业抑制 95% 的排放量,1906 年再次颁布制碱法,对行业作了分类,进一步控制有毒有害气体排放,还通过了控制烟气的其他法律。由于 1952 年上述伦敦烟雾事件造成极大影响,1953 年议会又通过更为全面和系统控制大气污染的《大气清洁法》。至此,大气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也已形成。

在英国按照法律规定,环境污染违法成本很高。对环境污染可视危害程度处罚,不设最高限,同时违法者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对违法情节轻微的,可适用简易程序给予处罚,以提高效率。公众对环境保护不满意,或认为政府部门不作为,可以起诉环保部门。

英国通过立法及上百年来持之以恒的努力,使工业革命开始的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治理。英国又恢复了过去的田园风光,污染最严重的泰晤士河如今已水净河清,绝迹 100 多年的大马哈鱼也重游故里,伦敦彻底摘掉“雾都”帽子,重现蓝天白云,成为环境治理的成功典型。

对上海环保立法的建议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上海不断加大对环境治理的力度,使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但由于环境污染日积月累,欠账较多,环境问题仍不容乐观,其中水环境污染更为突出,特别是郊区河道污染令人担忧,虽经多年整治,仍有三分之一河道为黑臭的五类水质。从空气质量看,一方面上海受输入性污染影响较大,另一方面上海自身污染排放也长期存在。“借东风”成为目前空气质量改善的重要因素。土壤污染治理更是任重道远,市中心以往化工、造纸等企业所在地土壤污染十分严重,郊区也有土壤污染重灾区。

由于土壤修复周期很长,治理需要几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

立法是环境保护的基本保障,英国的环保立法虽周期很长,但其特点是随着环境污染的逐步加重,不断加大力度且严格执法,同时注重对法律的完善和修改。近年来上海在环保领域的地方立法上不断加大力度,但相对于环境治理的艰巨任务,仍显得滞后。有的法规已时隔 20 多年,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有的与上位法已明显不符,有的处罚条款偏宽,不适合从严管理要求,还有一些领域存在立法的空白。立法滞后必然影响管理,英国曾有相当长时间,企业无序排放十分普遍,由于无法可依,政府存在不作为甚至放任现象,导致污染日益加重。议会立法后,企业成为环境保护主体,政府实施管理有了法律依据,由原来无奈和被动转为主动干预,先后成立中央卫生委员会、环保署,建立利益一的管理机构和监督机制。还在各地设立城镇卫生管理机构及卫生行政官,不仅管理公共卫生,还承担城市供水排污、环保及规划等职责。这些做法值得借鉴和参考。

上海与英国情况不同,英国做法不能照抄照搬,地方立法空间也有限。但在立法的适用性、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执法的有效性等方面,英国的做法值得借鉴。在当前社会对环境保护日益重视,国家环保法律法规逐步健全背景下,作为改革开放前沿,上海的地方立法还应主动发挥作用。

1.及时修法,保持法规的适用性。目前上海关于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有 10 部,其中 9 部为国家上位法的实施性法规。当上位法修改后,其不作相应修改就难以继续适用。如《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为 1992 年制定,其依据是 1988 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已作修改,新增规划管理、节约用水及水资源保护等内容,但上海的地方性法规至今未改。又如《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1997 年制定,期间上位法早已做过修改,这部法规现实中也已无法适用。此类情况在环保立法领域还有不少。为保持法规的适用性,当前应及时修改法规,以发挥好法规在环境保护中的引领作用。

2.整合资源,增强立法的协调性。目前地方性法规的起草主要依靠政府部门。由于体制多变,管理界面模糊,立法资源呈分散状态。表现在立法层

面,难免出现政出多门,相互脱节的状况。如在水环境保护上,环保和水务部门各成体系,水务部门主要从取水和水体过程对水资源的节约和利用进行管理,而环保部门则重点通过检测对各种水体的污染防治进行监管。两者在总体规划和实施操作上往往存在空缺,难以从源头实现法规的覆盖和全程监管。为此,要整合立法资源,加强部门间的协作和协调机制。同时进一步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广泛吸收民意民智,使立法与国家法律及客观实际相适应。

3.填补空白,提升立法的系统性。环境保护是一个系统,其各个领域互相联系,相互影响。在自然界大气、水、土壤是一个循环体系,任何一方面污染,都会对其他方面带来影响。上海地域狭小、河网纵横、雨量充沛,各种因素对环境的相互影响更为明显。当前土壤、海洋、湿地等领域在立法上还存在不少空白。为此应抓紧土壤污染防治,海洋、湿地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立法。另外,噪声、固体废物和辐射污染等也关系到民生和城市发展质量,其在地方立法上也存在空白。为此填补这些立法空白,不断提升立法的系统性十分重要。

4.加大力度,保证立法的有效性。处罚力度不大,违法成本过低常常是现实中法律法规的软肋。其中有些是当时立法的处罚尺度偏低,有些当时处罚虽重,但时隔多年现已明显过轻,对违法行为很难起到震慑作用。如《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规定,擅自填堵河道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现实中一些房地产企业擅自填堵、占用河道屡有发生,用地面积扩增获取的巨大收益,相对五万元封顶的罚款显然微不足道,其必然导致违法现象愈演愈烈。为此应当按照“实行最严格管理”的要求,加大处罚力度,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

当然,法律法规不可能解决环境保护的所有问题。立法也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超越阶段、违反规律,同时更重要的还有严格执法和从严管理。此外,还要善于运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体现资源的稀缺性,发挥好经济杠杆的作用。总之,只要全社会真正形成共识共同努力,坚持不懈实施环境治理,上海的明天一定能够与伦敦一样,实现天蓝、水清、地净的目标。

(作者为上海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环保委原副主任委员)

学者笔谈

思辨智库独立性

李凌

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会议指出,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对发挥民间智力、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具有重要意义。要优化发展环境,拓展社会智库参与决策服务的有效途径,完善社会智库人才政策。毫无疑问,《意见》的出台对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充分发挥民间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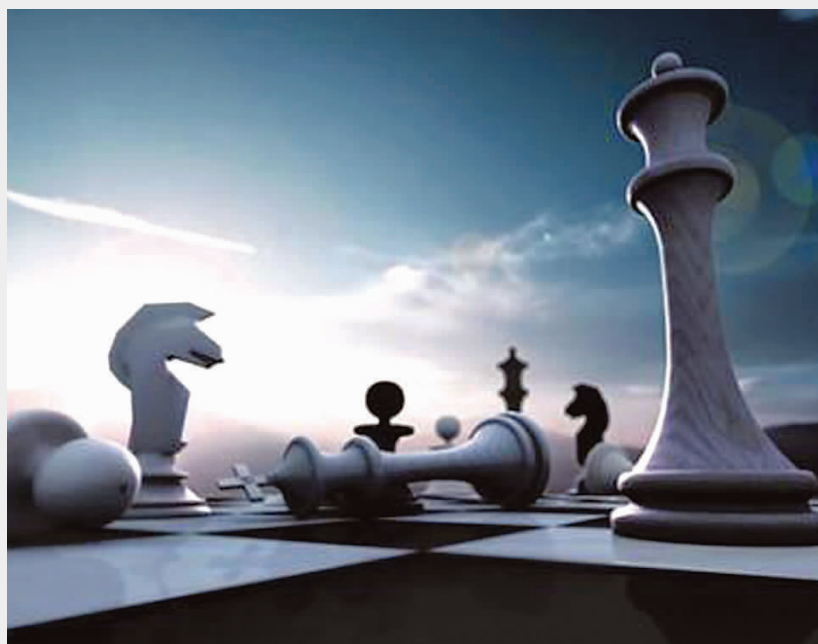
财务独立≠智库独立

社会智库如何更好地发挥咨政功能,独立性是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所谓智库独立性,传统理解崇尚智库的财务独立,认为资金来源的多元化是确保智库独立性的前提。大部分美国智库在管理层面都没有负责募集资金的人员和机构,专门负责通过各种渠道筹措智库发展所需的资金,包括政府、基金会、企业、出售出版物、私人募捐者等。来自美国政府的资助资金占比一般不会超过 20%,这一比例在布鲁金斯学会甚至不到 1%,卡托研究所甚至拒绝接受政府资助。也许是美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使然,标榜智库的财务独立性,成为判断一个智库是否独立的重要标志。

然而,美国智库真的独立吗?2016 年 8 月,《纽约时报》先后刊登了两篇报道:《智库是如何放大企业界影响力的》(How Think Tanks Amplify Corporate America's Influence)与《智库学者还是公司顾问?看情况》(Think Tank Scholar or Corporate Consultant? It Depends on the Day),揭露智库表面“客观”“中立”,实际却参与政客与企业家之间的权钱交易,然后替他们说话,甚至一些智库专家身兼多职,既享受智库学者“客观”“中立”的美名,同时又是职业说客或者在关联企业担任职务。无独有偶,早在 2014 年 9 月,《纽约时报》就曾发表过调查报告,从大量数据和谈话记录中发现,有 28 家美国智库参与了国际利益输送,涉及金额高达 9200 万美元,其中就包括了以“独立性”自诩的布鲁金斯学会等顶级智库。这些黑幕无疑彻底颠覆了对智库独立性的传统理解,把财务独立等同于智库独立只是美国智库用以掩饰其不独立的遮羞布而已。

关键在于供给侧改革

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智库独立



智库的独立性既不是财务多元,也不是对立对抗,更不是肆意妄为,而是服从于国家利益的独立思考与行动。

性?独立性的核心要义不是财务独立,而是思想独立。简而言之,就是不受外界干扰,包括权力和利益的干扰;不带着先验结论,去探究待解问题的本源,因此,思想独立下的智库研究是一个“求真”的过程。但仅仅以“求真”为目标,还不足以道明独立性的价值,作为连接知识与政策的纽带和桥梁,智库的生命力在于影响决策,因此,智库独立性,还包括行动的独立性,即以策略的方式,改变公共政策,协调利益关系,增进公共福祉。而实现行动独立的前提,是获得平等的主体身份和地位,尤其是作为思想产品供给方的主体身份和地位,这离不开智库自身的努力和高质量的智库产品。建立在广泛调查研究、翔实数据资料、科学理论依据基础之上,智库研究提出富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措施,是厚积薄发的一种表现。但凡浮躁和巧取的研究,都有损于智库的作用和独立性。

应当承认,就当前中国智库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体制内和体制外智库都有进一步提升独立性的空间。一方面,体制内财政拨款的智库面对的生存压力相对较小,有利于全身心地投入公共政策和国家战略研究,保持行动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体制外智库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紧紧围绕党和政府决策的重大课题开展咨询研究,保持价值的中立性。同时,增强智库独立性的主要途径,还在于深化智库产品市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一套有助于鉴别智库产品优劣的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研究项目甄选和管理中,引入公平竞争机制,采用平行立项和智库同行评议的方法,从源头上激发智库思想的独立性;二是在成果验收和评价环节,采用第三方评估和信息公开制度,斩断“拿谁的钱就为谁说话”的利益链条,确保智库行动的独立性。

总之,独立性既不是财务多元,也不是对立对抗,更不是肆意妄为,而是服从于国家利益的独立思考与行动。明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独立性,扬弃智库独立性的美国标准,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科学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意见》的出台,有助于从体制上鼓励社会智库增强独立性,这既体现执政党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又反映着眼长远的治国理念,也有利于避免重演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个人崇拜”和“千人一语”。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